

彭林 编

清代经学与文化

周禮

永嘉徐氏曰：周禮一書，周家法令故事之總綱也。九州政司，易教戰之法，或考工記所不備者，於此見之。度、兩、兩、代、之、有、周、之、禮、章、有、其、更、改、者、補、之、通、謂、之、周、禮、於、該、命、通、謂、之、周、書、也。信、之、者、以、周、仿、者、以、為、初、終、作、之、非、也。

又云：周禮補註，官三百六十，為數甚多，職事亦繁，不此官考，凡師、大夫、命、士、三百五十餘人，此官皆謂之官。司、閭、門、不、可、考、者、四、百、餘、人，春、夏、秋、三、官、皆、不、可、考。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清代经学与文化

彭 林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经学与文化/彭林编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-301-08611-3

I. 清… II. 彭… III. 经学—中国—清代—国际学术会议—文集 IV. Z12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3301 号

书 名: 清代经学与文化

著作责任者: 彭 林 编

责 任 编 辑: 谢丹云

标 准 书 号: ISBN 7-301-08611-3/G · 1443

出 版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

电 子 信 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

排 版 者: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

印 刷 者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90 毫米×1240 毫米 A5 14 印张 394 千字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前 言

2003年11月13日,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文哲研究所、佛光大学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“清代经学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”在深秋的清华园召开。这次会议的意义,正如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文哲所副所长林庆彰研究员在发来的贺信中所说,是内地第一次以经学的名义召开的学术会议。两天的会议中,38位学者发表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会议遵循国际学术会议的惯例,在每位代表论文报告之后,安排了论文点评,相与切磋,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。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,代表们在赋归之际,互道珍重,相约2005年再会于清华园。

为了展示这次会议的成果,我们选编了这本文集,其中有些论文,因作者已投送其他学术刊物,未能收入本书,令人略感遗憾。

本书的选编与出版,得到各位代表的真诚支持。澳门大学中文系邓国光教授、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吉雄教授、香港城市大学语文翻译部邓立光教授慷慨解囊,以个人名义资助了文集的全部出版费用,他们的义举,得到了与会全体代表的称颂。北京大学出版社马辛民先生为文集的出版,辛劳有加。值此文集付梓之际,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!

编者

目 录

易 类

通《经》致用

——以王夫之的易学为例…………… 邓立光(1)

李光地易学方法略论 …………… 钟彩钧(9)

诗 类

从楚简《诗论》之“文王唯谷”反思阮元之

“进退维谷”说 …………… 单周尧(27)

礼 类

读孙诒让《周礼正义·天官》笔记 …………… 李学勤(34)

清人学术视野中的敖继公与郑玄 …………… 彭 林(38)

论清人对《仪礼》丧礼所见首饰考辨 …………… 张焕君(51)

论清代学者关于《仪礼》篇末记问题研究 …………… 刁小龙(64)

清代《礼记·王制》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 …………… 王 铎(77)

春 秋 类

皮锡瑞的治学立场与《春秋》学研究 …………… 赵生群(92)

其 他

康熙与乾隆的“皇极”汉、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

——清代帝王经学初探…………… 邓国光(101)

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…………… 夏长朴(156)

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中所见的宋学…………… 劳悦强(193)

乾隆年间的文人经说…………… 龚鹏程(213)

从乾嘉学者经典诠释论清代儒学的属性…………… 郑吉雄(244)

《清史·儒林传》纂修之学术史反思

——由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到《清代学术概论》… 李纪祥(266)

江藩著述考…………… 漆永祥(299)

阮元《性命古训》威仪说的初步研究…………… 程 钢(325)

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

——对章太炎早期(截止于《馗书》重订本)

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…………… 刘 巍(343)

清代经师的讖纬观…………… 梁秉赋(387)

清初历算与经学关系简论…………… 韩 琦(409)

清代科举家族与经学发展述论

——以硃卷履历为中心…………… 张 杰(419)

通《经》致用

——以王夫之的易学为例

邓立光

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

摘要 本文先说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的内涵。通《经》之始，须先对经典文义有所掌握，就经文所涉人伦物理有所发明，此为训诂考证之大功；其终就所研治之经籍以体会其“常道”所在，以统摄一《经》之大义。如此，则通《经》可以致用。复以王夫之易学经世为通《经》致用之具体例子。学问与生命，一身与家国天下，须通而为一。先忧而后乐，则生命有光彩，而执《经》论道可无愧于先圣先贤。

关键词 通《经》致用 《十三经》《周易》 常道 训诂考证

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的意义

“通《经》致用”具有强烈的古为今用、复古更新的意涵。我们对“通《经》致用”一词有恰切的了解，便可避免理解上的分歧与不必要的争论。因此，本文先就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的内涵作一判定。

就“经”而言，传统儒学有《十三经》，从典籍的类属而言，包括了整个中国上古思想学术、政治文化历史等庞大内容。研究者于《十三经》中的任何典籍有整体的研究即可视为对《经》有所研究，只是研究方向有异，而归入不同的学术范畴，举例言之，《周易》如就其哲理作阐述则入哲学范畴；《尚书》如考其今古真伪则为文献研究；《诗经》如研究其属辞比事音韵等则入文学范畴；《周礼》而言其古制则是制度研究；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而言威仪之则即属古代风俗研究；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而言儒家政治理想则是古代政治思想研究；《左传》如侧重历史故实则入历史范畴；《尔雅》如作训诂之书则入小学范畴；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如作为言德之书、修身宝训，则入伦理学范畴。

典籍而以“经”言之，则其书具有“常道”的意涵。“常道”即显示出一价值标准，因此属于“经”的典籍（除了儒家经典之外，也包括其他宗教的经籍），其内容多涉及人生方向与行为准则，或辅成、强化人生方向与行为准则。这个人生方向所带出的价值，除了立己达己以外，兼有立人达人之义。以此，得经学常道之精神者，因而忧民之忧，乐民之乐。

就“通《经》”一层而言，通则无碍，举凡涉及“经”的内容，都能贯通而通之，所谓一事不知，儒者之耻即是，但这是就理想层面而言。由于各《经》可有不同的研究面向，要贯通一经的各个研究面向，实非易事，故本文所言“通”，但就一经的某一面向有所通贯而言，否则陈义过高，世所稀及，则失“致用”大义。就一经的不同面向而言通，则通才多有，彼以此为专，即专家之学。如就此专家之学，复有会于经中常道，则经中之小大精粗，俱为我所得，而可以谓之通《经》，可以言致用。

就“致用”一层而言，若仅有学术研究的心得与知识传授，此为纯学术之事，与通《经》而致用的问题无涉。用《经》以治世者，以经中故实为凭借，可用则用，不可用则置之，这是古为今用的通则。否则泥于古义，僵固不通，则虽有志复兴传统，而不能寄望有功成之日。以此为断，则经学研究，但就《十三经》范围的经典内容作文字疏解、名物训诂，如清人的考据之学即是，是为研究经学的基础。^①除此之外，当由所研究的经典中体会人生常道、处世原则。能如此，则治《经》当不至得其粗而遗其精。“致用”范围由一身以至于家国天下皆可，而“致用”也有直接与间接之分。直接致用可有补于个人的精神操守，可有益于世道人心；若形格势禁，当身无以致其用，然此心常在，精神不亡，著书立说，以待后人，则谓之间接之用。

因此，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第一步当就其所治经典而首尾通贯，就经文所涉及的人伦物理有所发明；第二步当由对所研治的经典体会其常

^① 钱穆说：“考据之学有他的价值，但是不能把考据之学提高到太过分的地位。”（《经学大要》第二十九讲，台北：素书楼文教基金会，2000年12月，页544。）

道所在,以此统摄一经的大义,即谓之通《经》,而可以致用。由此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的涵义,而论王夫之通《经》致用之学。

王夫之(1619—1692)事略

王船山与黄宗羲(1610—1695)、顾炎武(1613—1682)并称为清初三大师,梨洲及亭林皆能享大名于当身及后世,而船山则声名不显,其学术亦长期被忽视,“在当时,在本地,一点声光也没有。然而在几百年后,或在外国,发生绝大影响”,故被视为“畸儒”。^① 船山学问之博,由其著作一百余种,四百余卷、遍及四部可知。^② 故清初诸大儒,论著述之多,见解之深,实以船山为最。船山的学问“理趣甚深,持论甚卓,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,即列之宋明诸儒,其博大闳括,幽微精警,盖无多让。”^③

船山生当鼎革之际,不易素志。当张献忠(1606—1646)攻陷衡州,船山自刺重创以不从贼;当清兵入湘,船山即举兵反抗。其后获瞿式耜(1590—1650)荐举,永历帝(1623—1662)任为行人司行人,三劾当国王化澄,几乎不免。船山,一代大儒,学问渊博,对国族怀抱绝对忠诚,面对恶势力而不屈不挠,由其立身行事与出处大节而言,可谓体经而用经者即是。其后清兵克桂林,瞿式耜殉难,船山见事无可为,遂走归湖南。船山身受亡国之痛,虽有复国宏愿,无奈明廷已烂,孤臣孽子,形格势禁,致用无由,虽值青壮之年(时年三十三),只好隐居船山,并以为号,从事著述,寄望后人,其体经而行权有如此者。

① 梁启超: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台北:台湾中华书局,1978年9月,页74。

② 王船山著述,以1996年12月长沙市岳麓书社出版之《船山全书》十六册最为完备,此本无论在收辑或校对方面皆优于他本。以下所引船山资料,俱出于此。

③ 钱穆: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上册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0年1月台七版,页96。

船山学《易》以致用

清初三大师之中,有易学专著传世的,以梨洲与船山为代表。梨洲的《易学象数论》^①,是清代考据学的先声,对易学象数的出现时代及内容优劣有系统的说明,基本上对象数作了廓清的工夫,并具有总结性的意义。船山于《周易》象数,能推见其弊,与梨洲观点相同者甚多,又能别具慧眼,融通象数与义理。至于义理之学,船山更能善处忧患,得到孔门易学的精粹。船山的易学专著有《周易稗疏》、《周易外传》、《周易大象解》、《周易内传》,而关涉易理的如《张子正蒙注》、《思问录》等,表现了船山对易学的湛深学养。船山研《易》四十余年,于《周易》用功最多,得益于《周易》也最大^②,故本文以船山的易学为例以表述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的意义。^③ 本文以船山所撰《周易内传·发例》自述研《易》的历程^④为依据,述船山经世易学。

(一)“夫之自隆武丙戌〔1646,二十八岁〕,始有志于读《易》。戊子〔1648,三十岁〕,避戎于莲花峰,益讲求之。”^⑤

在明朝覆亡、南方抗清之际,人心大乱之时,船山奔走救国,备尝艰苦,而有志于读《易》,并深有体会,自言:“初得《观》卦之义,服膺其理,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,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,为精义安身至道,告于易简以知险阻,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,为翕张雌黑之术,所

① 见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九册,浙江: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2年12月。

② 曾昭旭评船山与《周易》的关系云:“以时会言之,船山之易学诸作,大率成于遭逢时乱,忧心悄悄之际。以期间言之,船山研《易》,始自丙戌(二十八岁),至于乙丑(六十七岁),其著书四十年,未尝不与《易》相终始。而以学问思想言之,则其学术系统之根本见地,盖始挺之于三十七岁作《易外传》之时也,则亦可谓船山学无非《易》矣。”(《王船山哲学》,台北:远景出版事业公司,1996年5月,页43—44)

③ 有关船山以易学用世的观点,汪学群指出,王船山“治经与汉学家不同,不囿于繁琐的训诂考据,而着力于扶发经学的义理,结合时代阐释经书的微言大义。”“他的易学借解释《周易》……具有哲理批判和经世的特征”(见《王夫之易学——以清初学术为视角》之《前言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2年5月,页3)。

④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,页683—684。

⑤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,页683。

得与于学《易》之旨者也。”^①船山对《观》卦的体会，在其后所著《周易外传》有所反映（见下文）。这是船山在抗清事业中所见南明的腐朽，基于深厚的国族感情，而悲愤莫名。因读《易》而知人事物理有其必然的趋势，遂以此安身。这是船山用《易》为精神指导，以为从事艰苦事业的凭借。船山这时对《周易》虽未能说学养湛深，然已能从《易》的理解悟用于立身行事，则船山以《易》致用之意甚明。1648年清兵南下益急，船山避乱于莲花峰，更用心于《易》理的讲求。船山有激于现实事势，深探《易》理以求对现实问题有更深刻的体认，这是船山易学的“致用”方向。

（二）“乙未〔1655，三十七岁〕，于晋宁山寺，始为《外传》。丙辰〔1676，五十八岁〕始为《大象传》。”^②

顺治十二年（1655）之时正是永历九年。此时明室存亡系于一线，船山对于南明朝廷在大难临头之际仍内讧自损，悲愤填膺。船山服膺《观》卦的义理，从《周易外传》言《观》卦之义，正反映了这一阶段南明的政治局面：

积治之世，富有者不易居也；积乱之几，仅留者不易存也。
《观》承《否》之后，固已乱积而不可拼矣。而位未去，而中未亡。
位未去，圣人为正其名，中未亡，圣人为善其教。^③

名者天之经也，人之纪也，义夫志士所生死争焉者也，庶几望之曰：“群英之来，非以相凌，而以相观。”^④

衰用其明威而不戒其瞻听，使溃败起于一旦而莫之救，徒令街恤于后者悲愤填膺而无所控泄，哀哉！^⑤

因此，《外传》之作，其实是船山“从永明王于广西，其时权臣恣肆，朋

①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，页683。

②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，页683。

③ 《周易外传》卷二，第一册，页872。

④ 《周易外传》卷二，第一册，页872。

⑤ 《周易外传》卷二，第一册，页873。

党交讧，谏不行而言不听，愤而丐去，假学《易》以明其忠悃……其言感慨淋漓，虽不必为经义之所应有，尚论者亦可以悲其志事矣。”^①船山对永历抗清之事，直至六十八高龄写《内传》此意犹存。

船山于释《观》卦卦辞云：

阳之仅存于位，而以俯临乎阴；人君子民情纷起之际，君子于小人群起之日，中国当夷狄方张之时，皆唯自立矩范，不期感化，而自不敢异志。若其不然，竞与相争，衰与相昵，自失其可观之德威，未有不反为其所凌者也。然岂徒位之足据哉！言必忠信，行以笃敬，动必庄莅，确然端己而有威可畏，有仪可象，有礼可敬，有义可服，颀若其大正，而后可使方长之阴潜消其侵陵而乐观其令仪。……君子之处乱世，阴邪方长，未尝不欲相枝害，而静正刚严，彼且无从施其干犯而瞻仰之，乃以爱身而爱道，盖亦若此。德威在己而不在物，存仁存礼而不忧横逆之至，率其素履，非以避祸而邀福，而远耻远辱之道存焉矣。^②

至康熙十五年(1676)，政治形势大定，船山心境也有所变化。在三十七岁写《外传》时，明室仍在，二十年后，明朝已完全覆亡，然船山家国之思仍不时流露，故船山说：“亡国孤臣，寄身于秽土，志无可酬，业无可广，唯《易》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，而拟议之难，又未敢轻言也。”^③无论如何，此时船山写成的《周易大象解》，已就学术观点，分判《周易》经、传，言“大象之与彖爻，自别为一义，取大象以释彖、爻，必龃龉不合，而强欲求之，此易学之所繇晦也。《易》以筮而学存焉，唯大象则纯乎《易》之理，而不与于筮。”^④船山对于《周易》已有深入体会，并判定经、传异同。但船山深于易道而志在用世，故通《经》致用的意识甚强，所以船山说“若夫学《易》者，尽人之事也。……苟精

① 柯劭忞写《周易外传·提要》之论。（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·易类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3年7月，页45。）

② 《周易内传》卷二上，第一册，页200。

③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，页683。

④ 《周易大象解·序》，第一册，页695。

其义,穷其理,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,君子无不可用之以为静存动察,修己治人、拨乱反正之道。”^①也由于有通《经》致用的观念,故读《易》用世之意甚强,“故《否》而可以‘俭德避难’,《剥》而可以‘厚下安宅’,《归妹》而可以‘永终知敝’,《姤》而可以‘施命诰四方’,略其德之凶危,而反诸诚之通复……《大象》,圣人之所以学《易》也。”^②船山意在致用,故所言修己治人之道,“深切著明,有裨于反身之学。”^③

(三)“岁在乙丑〔1685,六十七岁〕,从游诸生求为解说。形枯气索,畅论为难,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《〔内〕传》,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,错综合一为象,彖爻一致,四圣一揆为释。”^④

船山晚年,说《易》已转入以学术正人心之途。《周易内传》即体现出以儒家义理之学为宗,“占学一理,得失吉凶一道为义,占义不占利,劝戒君子,不读告小人为用,畏文、周、孔子之正训,辟京房、陈搏、日者、黄冠之图说为防。”“守《彖》、《爻》立诚之辞,以体天人之理,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。”^⑤船山不以能言为事,而以修德为贵,所以说“躬行不逮,道不足以明,则夫之所疚愧于终身者也。”^⑥

总 结

船山的“通《经》致用”思想,凸显在他对《周易稗疏》的态度。由船山六十八岁(1686,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仲秋)写成的《发例》,自述研《易》历程,对《稗疏》不及一言。然而《四库》馆臣对船山的《易》著,除了《稗疏》之外,一概不收,而《四库提要》云:“是编乃其读《易》之时,随笔札记。”^⑦《四库简明目录》则云:“皆随笔札记,以剖析疑义……

① 《周易大象解·序》,第一册、页695。

② 《周易大象解·序》,第一册、页695—696。

③ 柯劭忞《周易大象解·提要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·易类》,页44。

④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,页684。

⑤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,页684。

⑥ 《周易内传发例·二五》第一册,页684。

⑦ 《四库全书总目·经部·易类》卷六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6月,页35。

惟引据训诂，考求古义，所谓征实之学也。”^①船山自述研《易》而不及《稗疏》，以其为训诂之书，为读《易》之助，于寄寓志节无以为功，故不及焉。至于寄寓与发挥船山思想气节、学而致用的《易》著，《四库》馆臣则全数摈弃，此中消息，除了触犯忌讳之外，更有训诂考证与“通《经》致用”的殊辙。

^① 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·经部一·易类》卷一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1月，页29。

李光地易学方法略论

钟彩钧

(台湾)“中央研究院”中国文哲研究所

李光地,字晋卿,号厚庵,学者尊称安溪先生,卒谥文贞,福建安溪人,生于明崇祯十五年,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,年七十七(1642—1718)。李氏为清初朱学领袖,主编《朱子全书》、《性理精义》,尤邃于易学,最主要的著作为《周易通论》、《周易观象》,并主持《周易折中》^①的编纂工作。本文以《周易通论》为主,参之以《周易观象》、《周易折中》,对其易学方法略作探讨。由于李光地易学的内容十分丰富,本文主要从义理易学的角度来探究,至于李氏对于象数的观点与方法,限于学力,只有等待日后再研究了。

一、卦与爻的贯通

李光地易学的性质,可从下引对易学史的评语来看:

年来觉得周易一经,惟孔子透到十二分。不独依书立义,义尽而止,有时竟似与原文相反,却是其中至精至妙之义,觉有透过之处。此经汉人只以术数推演,至辅嗣始从事理解,但发明处少,只算得一分。孔疏亦算得一分。周子易通之作,直通身是易,但于本文未有诠释,算得七分。程子虽有传,精采少逊,算有六分。邵子先天图,精妙无比,但说理处略,亦算有六分。朱子

^① 《周易通论》、《周易观象》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3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2册。《御纂周易折中》,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6年《易学精华》景印同治刊本。此外,本文并参考〔宋〕程颐:《周易传》,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68年2月景印古逸丛书覆元至正本。〔宋〕朱熹:《周易本义》,北京:中国书店,1987年10月景印宋咸淳本。以上各本引用时皆直注卷页数。

集成，复从占筮中见理，又透过一分，算有七分。至元明以来，不见作者矣。（《语录》^①卷9，页152—153）

这段文字说明了其易学重义理、重宋易。程颐《周易程氏传》、朱熹《周易本义》自元代起悬为功令，为学者普遍研读，遂成为义理派易学的基准。李光地的易学著作亦不例外，试翻《周易折中》，不但本于朱子《本义》区分经传，其注释则先列《本义》、《程传》，再选录诸儒之说，最后断以己意。李光地易学的性质，可以说是义理派或宋易派的集大成者。

窃以为研究义理派或宋易派的著作，若取《程传》、《本义》对读，当有助于理解其特点。笔者略加对读之后，认为李氏易学的特色在文义的贯通，其中最基本的是卦爻辞义的贯通。以下两段文字表现他以卦爻贯通为基本方法：

凡著书，须大主意定，若只在字句上著脚，无用。某初治易，有了几年工夫，逐爻看想，觉得三百八十四爻都不相粘。后将每卦炼作一篇文章，然而逐字逐句顺将去，其初以为一二处不明白，且混将去。那知此一二点黑处，正是紧要处。有一字一句作梗，便是大主意不确。到得无一字不顺，就是虚字都应声合响，才印证得大主意不错，则逐字逐句又大力也。立大主意与逐字句求解，盖相为表里。（《语录》卷9，页155）

伊川治易，逐爻去看他道事情。后来尹和靖得伊川之传，教人看易，一日只看一爻。朱子便说易是联片的，如何一日只看一爻？问：“初学可以逐爻看起否？”曰：“使不得。每一爻如投词人，是个原告、被告，必须会同邻佑、乡保、证佐，四面逼紧审问，方得实情。不然虽审得是，亦不敢自信。不通六爻全看，虽一月看一爻，亦无用。”（《语录》卷9，页154）

“大主意”指一卦的主旨，“逐字句”指卦中所有字句，特别指爻辞，因

^① [清]李光地著，陈祖武点校：《榕村语录·榕村续语录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年6月），本文征引时简称《语录》。

为爻辞有许多“不相粘”(不相关或关系不密)之语。李光地的工夫在找出它们的相关性,使之成为关联紧密的整体。李光地又谓爻不能单独看,须配合全卦六爻来看,这正指出《程传》的一个问题,就是对某段卦爻的深入发挥,未必是其原义,因而亦无助于对全卦的理解。^①

卦爻一体本应是解释周易的原则,如乾卦,卦辞“元亨利贞”,表示万物生长成就的四德(依《程传》),而爻辞则表示龙从潜隐至亢悔的整个历程。可见六爻之间是有组织,且有发展关系的,而其整体所表达出来的义理,又与卦辞相应。还有不少卦也能明显看出六爻的组织以及卦爻的配合,如剥卦、咸卦等。今天我们已不认为周易是圣人有意的创作,而是由长期占筮所累积的卦爻辞所组织成的,但我们仍认为编辑者在组织的过程中,会尽量将相关的卦爻辞聚在一起,而构成系统。古人以周易为圣人制作,则对卦爻辞一体的主张,毋宁是必然的。然而,理论与事实常有距离,许多卦的卦辞与爻辞,以及六爻爻辞之间的关系,似乎并不密切,于是解释时也不容易视为一体。这种情形在朱子《周易本义》,有时比《程传》还要严重些。因为《程传》重义理,而《本义》重卜筮,对一些歧出的文句,仅以占者所问之事释之,不再纳入该卦爻的义理系统去解释。《本义》的作法减少了穿凿,但也就更不必谨守卦爻一体的原则了。^②

李光地易学最大特色是卦爻合释。《周易通论·论卦名辞爻辞》云:

① 兹以下文所引的《程传》对巽卦大象的注解为例证。程伊川对大象“重巽以申命”,解释为:“上下皆顺,重巽之义也。命令政事顺理,则合民心而民顺从矣。”伊川认为天理表现在人民的公心之中,因而有“夫民,合而听之则圣,散而听之则愚”之言。见《二程全书·二程遗书》(台北:台湾中华书局,1969年四部备要本),卷23,页4下。此处两个巽间加入了“顺理则合民心”,实为其哲学的重要概念,但这是对孤立语句深化的结果,与卦爻整体理解较无关系。

② 兹再用下文巽卦为例证。九二爻辞“用史巫纷若,吉,无咎”,朱子《周易本义》云:“亦竭诚意以祭祀之吉占也。”指出除以诚意表达过巽外,此爻还可能有另外的意思,即祭祀者占之而得吉。六四爻辞“田获三品”,《本义》云:“又为卜田之吉占也。”朱子只以实用的占卜之辞视之,可以减少义理的附会,但由于占卜是孤立歧出之事,就可以不顾虑意义上的一致性了。